

中國美術全集

工藝美術編
金銀玻璃琺瑯器

10



中

國

美

國

全

國

美

國

美

第一屆全國代表大會

第一屆全國代表大會

第一屆全國代表大會

第一屆全國代表大會

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

中國美術全集

工藝美術編 **10** 金銀玻璃琺瑯器

中國美術全集

工藝美術編10 金銀玻璃珐瑯器

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 編

本卷主編 楊伯達

出版者 文物出版社

(北京五四大街二十九號)

責任編輯 段書安

封面設計 仇德虎

版面設計 彭華士 何巧珍

圖版攝影 胡錘 劉志崗 郭羣

王露 姜言忠 張平

陳振戈

主編助理 鮑勇

印刷者 人民印刷廠

發行者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

一九八七年三月 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書號 八〇六八·一六二五

國內版定價 一三五元

版權所有

中國古代金銀器玻璃器琺瑯器概述

楊伯達

中國古代工藝美術，絢麗多彩，風格獨特。諸如玉石器、陶瓷器、青銅器、漆器、印染織綉等，均在世界上享有盛譽。我國古代的金銀器、玻璃器、琺瑯器工藝，在產生的時間、發展的高度和普及的廣度上，雖然都不如上述工藝門類，但在我國工藝美術史上，它們仍不失為具有不同程度影響的幾個重要工藝品種。金銀器和玻璃器工藝，迄今在我國已有二千餘年的歷史，尤其金銀器，在其發展歷程中，曾產生過無數優秀的作品。我國的琺瑯器工藝，據《格古要論》中關於「大食窖」和「拂郎嵌」的記載，可能來自西方，但它在中國也已有上千多年的歷史。而且此種工藝傳入我國之後，便迅速地融匯了中國文化的傳統因素，走上了自己獨立發展的道路。以下，分別對我國古代金銀器、玻璃器、琺瑯器工藝的發展歷程作一扼要的介紹。

金銀器工藝

所謂金銀器，是以貴金屬黃金和白銀為基本原料加工製成的器皿、飾件等。在我國，黃金一般分為山金和砂金。被人類發現較早的應是砂金，依其形而名之為麩金、瓜子金、豆瓣金等，名目繁多，不一而足。銀又稱白金，與其它礦物夾生共存。在物理性能上，金不怕氧化，不易生銹，不溶於酸鹼，延伸性較強。而銀在這些方面都不及金，加之銀的儲藏量較金為多，所以，它遠不如金珍貴。就金器工藝而言，在水平上不僅高於銀器工藝，而且產生時間亦早於銀器工藝。製作金器，主要有熔煉、範鑄、錘鑠、焊接、炸珠、鑄鏤、抽絲、編纜、掐絲和鑲嵌等技法。這些技法，有的來自青銅工藝，有的係金器製作者的獨創。譬如錘鑠，即以錘敲打金塊，使之



插圖一 金貝

延伸展開呈片狀，再按要求打造成各種器形。一般說來，凡隱起的器物 and 紋飾圖案，往往是經過錘鍊製成的。再如炸珠，是將金熔液滴入溫水內，使之結成大小不等的金珠。用這些金珠，可以粘焊魚子紋或聯珠紋飾。製作銀器的技術與方法，幾乎完全來自金器工藝。此外，人們還把金、銀用於青銅器、漆器及織綉之上，以增添光彩奪目、富麗豪華的特殊效果。但此種工藝與金銀器工藝本身不同，不屬本文闡述範圍。

科學發掘的資料證明，我國最早的金器產生於商代。在我國河南、河北、北京、山西等地的商代遺址和墓葬之中均有金器出土。其中商殷中心區域出土了金片、金葉、金箔等飾件，離這一區域較遠的地方出土了金質首飾。北京平谷商代中期墓葬中出土的金臂釧、金耳環、金筭及金箔殘片等，經化驗含金達百分之八十五，雜有多量的銀和微量的銅。金筭為範鑄而成，金臂釧和金耳環似用錘鍊法製成。金臂釧的兩端錘成扇形，再彎成環狀。金耳環一端錘成喇叭口狀，一端錘成尖狀，器身彎捲成圓形。金箔殘片為薄薄的金片，似原作器物嵌件用，與後世用於建築或漆器上的金箔不同。此墓出土的青銅器與中原地區所出青銅器形制極似，其為商代邊遠地區的墓葬當無疑。這裏出土的金器，與北京昌平雪山村、房山劉李店、河北唐山小官莊及內蒙古敖漢旗大甸子等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址或墓葬中所出某些金、銅製品形制相似。這些金器，或許就是商代邊遠地區少數民族製品。

商代晚期金器主要出土於山西石樓後蘭家溝。這裏出土的青銅器有罍、爵、斝、鏃、戈，還有少數民族形式的勺、刀、弓形器等，表明這裏的商文化和晉西北少數民族文化處於共存狀態。據考證，這一地區可能就是商代的鬼方，這批文物當是商文化與鬼方文化的結合體。這裏出土的三件金珥形器，其中兩件大小相同，另一件較小，均有串珠一粒。其一端尖捲如渦紋，另一端較平，出一細絲尾柄，串珠後再從中間彎曲斜下，尖部折上呈乙形，造型奇異，可能也是邊疆少數民族製品。在青海屬辛店文化的大通縣上孫家寨四百五十五號墓，還出土了金耳環和金貝等（插圖一）。

上述情況表明，我國商王朝中心區域及其北部、西北部少數民族地區的早期金器工藝，均建立在高度發達的青銅器工藝的基礎之上，但其形制和功能與青銅器有所區別。尤其是北方金

器，具有鮮明的少數民族特點。這一特點，在以後的發展過程中反映更爲突出。

春秋戰國時期的金器，在我國遼寧、新疆、陝西、內蒙古、河北等廣大帶均有出土。重要的發現有內蒙古杭錦旗阿魯柴登、準格爾旗西溝畔、陳巴爾虎旗完工和陝西神木納林高兔等戰國時期的匈奴墓。

西溝畔匈奴墓出土金銀器中，馬、鹿、鷹啄鹿身異獸以及互相咬鬥的兩獸等紋飾，動物形象多爲蹲伏或直立姿態，運動感不强，與匈奴族騎獵生活的情景不甚吻合。這些金器，均以塊金錘鑠成薄片，再錘出隱起圖案，邊以淺凸起的繩紋勾勒，遒勁流暢，富有繪畫中的綫描趣味。同出的銀卧馬紋飾片，圖案、作工與金卧馬紋飾片相同，表現了金、銀器工藝的一致性。其中的有銘金銀飾片尤其引人重視。兩件虎豕咬鬥紋金飾片背部邊緣處，一件陰刻「一斤五兩四朱少半」，一件陰刻「一斤二兩廿朱少半」，故豕豕虎三。七件銀節，除刻有「兩朱」銘外，其中六件還刻有「曷」工銘，一件刻「少府」銘。據考證，刻有「故豕豕虎三」的金飾片應是秦國所製，而七件銀節應是趙國所製。這反映了與匈奴接壤的秦、趙等國與匈奴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如果仔細觀察這批金器，我們會發現，秦國所製虎豕咬鬥紋金飾片上虎豕互咬後臀的場面及隱起手法的效果，與匈奴所製雙獸咬鬥紋飾牌上兩獸互咬肢頸的情景及平凸工藝的趣味是有所不同的。兩獸咬鬥是匈奴等草原游牧民族喜愛的紋飾。秦國所製金飾片雖採用了這種紋飾，但在兩獸咬鬥的處理上却與匈奴製品不同。匈奴製品所飾圖案，虎獸相對，虎咬異獸前肢，異獸咬虎頸項，而秦國所製飾件，獵取兩獸互咬後肢的場面並以繩紋作框欄。在形象刻劃方面，匈奴飾件圖案是靜止的，裝飾的，而秦國飾件圖案則是動態的，寫實的。

內蒙古杭錦旗阿魯柴登出土了迄今最爲珍貴的匈奴王遺物。其中金器二百一十八件，共重四千餘克，還有銀器五件。如此重要的發現，在我國匈奴族考古史上是罕見的。這次出土的金器品種極其豐富，有鷹形金冠頂、金冠帶、長方飾牌、虎形飾片、羊形飾片、刺狷形飾件、鳥形飾片、鳥紋圓釧、金串珠、金鎖鏈、金項圈及金耳墜等。製作方法包括範鑄、錘鑠、鑄鏤、抽絲、編繫、掐絲、鑲嵌等，幾乎使用了金細工藝中一切技術，足以代表戰國晚期匈奴王室金細工藝的技術水平和藝術造詣。其中鷹形金冠頂和金冠帶，可稱匈奴族金器工藝的代表作。鷹形



插圖二 鷹攫羊金冠飾

金冠頂下部是半球形，球上浮雕狼與羊對卧的紋飾。球上立一隻雄鷹，作俯視狀。金冠帶由三條半圓金帶組成，兩端浮雕卧狀馬、虎及羊。造型生動，製作精良。這種鷹攫羊形金冠飾，在公元前四世紀的伊朗薩卡遊牧民族中也很盛行（插圖二）。金耳墜，結構也相當複雜，以錘鍊、炸珠、焊接、掐絲等多種技法製成，技藝極為精巧，是迄今發現最精美的耳墜。金鎖鏈，直徑○·四厘米，以多股細如毫髮的金絲編成，精美絕倫，反映了匈奴族編絲工藝的高超技藝。

陝西神木納林高兔戰國晚期匈奴墓出土了金鹿形怪獸、金虎、銀虎、銀鹿、銀環、透雕花蟲銀飾片以及錯金銀柄等。此墓金銀器的特點是在較多的動物形象上採用了立雕或浮雕的手法。鹿形怪獸，以範鑄、鑄鏤、鑿刻等多種手法製成，鹿角粗大捲曲，而鹿身纖細窈窕，四蹄合攏，似乎很不相稱。這種重心前傾蘊藏着衝擊力的處理方法，是頗具匠心的。此怪獸應是以鹿的形象為主體，兼取鷹首及馬、駝的局部組合而成，其顯然是出於某種觀念的需要而創造的超現實的、幻想中的異獸，可能是匈奴族的崇拜物。金虎、銀虎、銀鹿等立雕或浮雕動物，神態生動，形象逼真。金虎身上的瓦紋裝飾極富特色，達到了寫實手法和裝飾意趣的高度統一，與同時期中原各國製作的動物形象和技藝手法有相通之處。

北方少數民族金銀器的工藝特點已如前述。中原與南方的金銀器，出土地點極為分散，數量也很少。中原地區，如陝西鳳翔馬家莊春秋中期一號宗廟遺址出土了金異獸、蟠虺紋金泡、素面金泡、金節約等二十九件，共重三百多克。河南輝縣固圍村戰國晚期墓出土了鏤花銀片、銀泡、包金鑲玉嵌琉璃銀帶鈎。山東曲阜魯國故城戰國墓出土了猿形銀飾等金銀器。南方地區出土的金銀器雖不多，但却十分重要。如浙江紹興三〇六號戰國初期墓出土的玉耳金舟，高六厘米，徑十一·二至十四·二厘米，連耳重二百八十五克，是迄今在該地發現的最早金器之一。器上安有玉耳，反映了金玉結合工藝在南方已經開始。長江流域的湖北隨縣曾侯乙墓出土了金帶鈎、金盞、金勺、金杯等。金盞高十·七厘米，口徑十五·一厘米，足高○·七厘米，重二·一五公斤，是迄今出土最重的一件金質器皿。它採用紐、蓋、身、足分鑄，再合範澆鑄或焊接成器的方法，工藝較為複雜，與青銅器的鑄造方法很相似。據考證，此墓下限約在公元前四三三年或稍後，是戰國初年南方的侯墓。由於曾侯乙與楚王關係密切，有人認為此金盞是楚器。

或由楚國工匠製造的。江蘇漣水三里墩西漢墓出土的兩件戰國時期的金帶鉤，均採用立雕、淺浮雕、陽刻、鑲嵌等多種技法製成，富有立體感，是金帶鉤中的精工之作。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楚王銀匱，打造精工，是迄今發現的最早銀質器皿之一，彌足珍貴。

春秋戰國時期的金銀器，中原地區與匈奴少數民族地區的風格較為不同。山東、浙江、湖北等地出土的金銀器，多為器皿、帶鉤等，它們一般採用範鑄法製成。內蒙古、陝西等地出土的匈奴族金銀器，主要是首飾及馬具上的飾件，極少見器皿類器物。工藝上已達到完善程度。

秦代金銀器製造業的情況，目前所知甚少。出土金器屈指可數。山東淄博窩托村西漢齊王劉襄墓陪葬坑出土銀器一百三十餘件，其中秦始皇三十三年造鑿金刻花銀盤，紋飾鑿刻精緻嫺熟，綫條富旋律感。兩件略小的銀盤，口沿飾波折紋和花葉紋，腹內外飾幾何雲紋，內底飾三條雲龍紋，全部紋飾鑿金。這幾件銀盤，反映了秦代金銀器工藝的一個側面。

兩漢時期的金銀器，在我國南方出土不多，主要出土地點有江蘇盱眙、漣水、邗江、安徽合肥，廣東廣州等處。江蘇盱眙南甯莊窖藏中曾發現金版、金餅及金獸。金獸出土時蓋在裝有金幣的銅壺口上，重九千克，含金量達百分之九十九。金獸作蜷伏狀，兩前肢置於額下，頸部戴三輪項圈，額間有一環紐，通身錘飾圓形斑紋，似仿豹身上黑色斑點，這種製作方法至今仍為孤例。毫無疑問，此金獸屬金製品中的重器。江蘇邗江甘泉二號漢墓，係東漢初廣陵王劉荆之墓，出土了金泡形飾、龜紐廣陵王璽、盾形飾、品形飾、王冠形飾、空心球、龍形片飾及銀碗等。金泡形飾，弧面上飾掐絲四瓣花一朵，中心掐一圓圈，花瓣之間亦掐小圓圈，花朵四周圍以掐絲和金珠，工藝極其複雜。根據同出金飾上均嵌綠松石的情況，此泡形飾似原亦嵌有綠松石或水晶、玻璃等，呈現多色對比。王冠形飾，由八個「山」形金片環接而成，形若西方的王冠。每一「山」的兩個斜邊上飾以魚子金珠，內掐葉形金片並嵌松石。龍形片飾殘長四·六厘米，以較薄的金片鏤刻火焰與龍形，在黃豆粒大小的龍頭上以金絲掐出眼、鼻，再填焊小金珠。龍身用掐絲焊珠製出多種圖案，火焰亦用同樣手法填充細部。上述金器雖然很小，但作工極為精細，採用了掐絲、炸珠、焊接、鑲嵌等技法。這一批金器的出土，說明東漢初年的金細手工藝已達到很高的水平。安徽合肥西郊烏龜墩東漢末期墓出土了一件「宜子孫」金飾，高二·三厘米，

最寬一·五厘米，似鐸形，紐中一圓孔，供佩帶之用。器身四周飾以掐絲焊珠，正中有掐絲「宜子孫」三字，字兩邊S形火焰紋亦為掐絲焊珠，並有四個嵌槽。這一發現，表明金細手工藝至東漢末年仍然不衰。一九八三年發掘的廣州南越王墓出土了「文帝行璽」龍紐金印、「泰子」龜紐金印、「右夫人印」龜紐金印、金帶鉤、金銀串珠、銀盒、銀匜、金杯形器、金飾片等。反映了嶺南地區金銀器工藝的發展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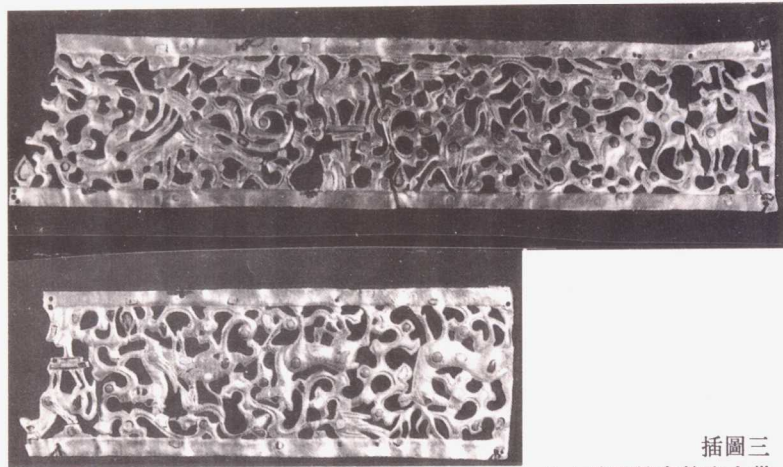
北方出土兩漢金銀器主要有河北滿城劉勝墓及定縣劉脩墓、劉暢墓。中山靖王劉勝墓出土了金器十二件、銀器七十七件，如金醫針、銀盒、銀漏斗形器等。中山懷王劉脩墓出土了金餅四十塊和馬蹄金、麟趾金等。馬蹄金、麟趾金範鑄較精，上口蓋有掐絲聯珠鑲玻璃面罩。這種馬蹄金、麟趾金不單爲了「協瑞」，可能還有其它用途。中山穆王劉暢墓出土了金器八十件、銀器二十五件。如掐絲龍形飾片、掐絲金龍、掐絲金辟邪等。其中掐絲金龍最爲工緻，它以金片捲成圓筒形，頭部焊以掐絲口、鼻、眼，額頂焊粗金絲製成的龍角，角根纏以細金絲。頸部鑲空鱗紋，並焊金珠。此龍採用了錘鍊、焊接、掐絲、累絲等多種工藝製成。

北方少數民族金銀器工藝在兩漢時期仍有所見，如甘肅華池出土的西漢初年異獸相對金牌，吉林榆樹東漢初期鮮卑墓出土的金銀飾件，工藝上主要採用了金絲編綴及錘鍊等技法，遠不及戰國晚期匈奴墓出土的金銀器繁複精緻。

上述兩漢金銀器主要的製作技術有：(一)成形方面，以錘鍊、焊接爲主，範鑄者較少。(二)圖案花紋的加工往往先錘打而呈立雕或淺浮雕之後，再採用鐫刻等方法。(三)熔金爲珠，再焊成聯珠、花紋或魚子紋地。(四)拉金成絲，編綴成辮股或各種網狀組織，焊接於器物之上。(五)以金絲堆疊各種鏤空狀圖案。(六)較廣泛地運用掐絲鑲嵌。鑲嵌用材以玉、松石、瑪瑙、玻璃爲主。與西方金細鑲嵌寶石工藝不同的是，尚不見以寶石作爲鑲嵌材料。這是因爲受到了資源的限制。以上六點，標誌着金銀器工藝已經脫離了青銅器工藝的傳統技術，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並達到成熟的階段。此外，兩漢時期還繼續採用包、鍍、錯、鑲等方法用金銀裝飾銅器或鐵器，有的還將金銀片打成金箔或製成泥屑，用於漆器、絲織物上，以增強其富麗感。兩漢王朝與西方往來比較密切，通過絲綢之路和海上貿易，西方金銀器流入中國。同樣，兩漢時



插圖四 狩獵紋銀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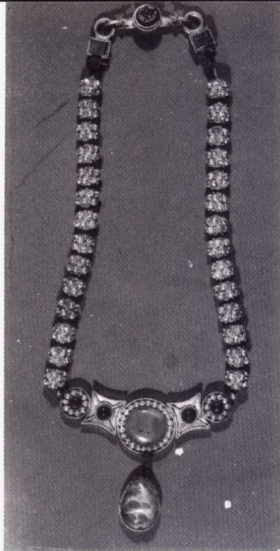
插圖三
仙人騎獸鏤空鑲嵌金帶

期的金銀工藝品也隨着絲綢織物運往西方。一九三九年在蘇聯哈薩克共和國阿拉木圖附近卡魯嘎路伊溪谷出土的仙人騎獸鏤空鑲嵌金帶(插圖三)，即有典型的中國漢代風格。

三國、魏、晉、南北朝時期，兵家相爭，國土分裂。金銀器工藝在這一形勢之下仍有所發展。出土資料證明，自魏、晉、南北朝時期起，金銀器的社會功能進一步擴大，技術更加嫺熟，器形、圖案也不斷創新。湖北鄂城、南京北郊、長沙黃泥塘及甘肅敦煌等地東晉墓出土的少量金銀器反映了這一趨勢。這一時期，北方少數民族金銀器也有重要發現。如內蒙古達爾罕茂明安聯合旗出土的鮮卑族金龍、牛頭鹿角金飾、馬頭鹿角金飾等，造型均極其生動。遼寧北票西官營子北燕馮素弗墓出土了「范陽公章」龜紐金印、金冠飾、人物紋山形金飾、鏤空山形金飾片、喇叭管形金器、筆帽形金器、鏤空飾件金襯片、長條形金片、金釵、小銀笄、銀帶環等。這些金銀器反映出來的文化內涵，既有中原文化傳統，又有當地少數民族文化因素，還有佛教的影響。內蒙古涼城縣小壩子灘發現了鮮卑猗廋部的一批金器，有獸形金飾牌，鑲嵌寶石的獸形金飾，飾以獸首的金指環、金耳墜以及西晉的駝紐「晉烏丸歸義侯」金印、駝紐「晉鮮卑歸義侯」金印、駝紐「晉鮮卑率善中郎將」銀印等。其中一件獸形金飾牌，背面鐫「猗廋金」，猗廋即猗廋，說明此牌是西晉末力微子猗廋部的遺物。此金牌上四獸分上下兩層，作臀部相對狀。這種風格顯然出自匈奴族，而又與匈奴族有所差別，是鮮卑族金器工藝的代表作。內蒙古科爾沁左翼中旗希伯花鮮卑墓羣出土了一些金器，其中金奔馬、金瑞獸有一定代表性。金奔馬為範鑄而成，頸部與臀部各接一圓環，環上穿以金鍊，造型極為生動。河北定縣北魏塔基石函中出土了金耳墜、金片、銀寶瓶等，其中金耳墜製作精細，上部為一圓環，中部墜一用金絲編綴的圓柱，圓柱兩端各掛五個掐絲鑲嵌金片，金片之間有五個小金珠，下部為六條金鍊，分別垂掛尖狀金墜。這種形制，顯然係鮮卑族製品。山西大同小站村封和突墓出土了鎏金銀盤、銀耳杯、銀高足杯。銀耳杯杯口呈兩邊高中間低的鞍形，底有橢圓形圈足，足部邊緣焊聯珠一周。較漢代羽觴有所變化。鎏金銀盤(插圖四)是波斯五世紀的產品，反映了北魏王朝與西方的經濟往來和文化交流。河北贊皇東魏李希宗墓出土的曲水紋銀杯、磁縣東魏茹茹公主墓出土的飛天紋金飾、山西太原北齊婁叡墓出土的花卉禽獸紋金飾，都是當時金銀器中的優秀作品。



插圖六
高足金杯



插圖五
金項鍊

隋代金銀器的重要發現，迄今僅有李靜訓墓出土的金杯、金項鍊、金手鐲、金戒指、銀杯、銀篋、銀勺等。據夏鼐先生鑒定，金項鍊（插圖五）是從西亞傳入的，金杯（插圖六）、銀杯均由伊朗薩珊朝傳入。其餘器物當是中國產品。但僅從這幾件金銀器，還無法了解隋代金銀工藝的全貌。

唐代金銀器出土甚豐。建國後出土的金銀器主要集中於陝西西安附近和江蘇鎮江地區。

北方出土的唐代金銀器，絕大部份製造於皇家作坊。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是甘肅涇川縣大雲寺舍利石函內的金棺銀槨及金銀釵。銀槨以錘鑠焊接法製成，鑿刻陰綫纏枝忍冬花紋，莖蔓纖細，捲舒有力，繼承了南北朝的某些風格。金棺亦用錘鑠法製成，並以掐絲製成蓮花、柿蒂、寶珠、流雲、花草等圖案，分別嵌以珍珠、石英、松石等。說明唐代仍以掐絲鑲嵌作為金細手工藝的最高目標。可以說，金棺銀槨是唐初精美的金銀工藝品。陝西西安東北郊大明宮東內苑遺址發現了大小銀盤和銀鈿。其大銀盤為六瓣花口，邊飾曲枝牡丹及花苞紋，盤心隱起回首張口的行獅，細部以陰綫處理，極其生動。盤底有銅鑄捲葉式三足。從獅紋及圖案的風格來看，此盤當不晚於天寶年間。一九七〇年十月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了金銀器二百七十件，這是建國以來一次重大發現。有碗、杯、觴、壺、盒、匣、薰球、釵、龍、梳背等，種類相當豐富。其掐絲團花金杯，用掐絲製成團花和骨朵雲形，中間嵌以珍珠、松石等，現嵌件雖已脫落，但仍能想見當時的華美。舞伎八棱金杯，通體錘鑿隱起八個舞伎，構成絢麗多姿的歌舞場面，其精湛的技藝，令人贊嘆。刻花赤金碗，先錘鑠成形，再鑿隱起的雙重花瓣和陰綫花紋，金碗敞口撇足，足邊緣焊一周聯珠。這三件金器，仍以掐絲、焊珠、鑲嵌為主要裝飾手段。寶相花銀蓋碗、鑿金歌舞狩獵紋八瓣銀杯、鸚鵡紋提樑銀罐、狩獵紋高足銀杯、刻花塗金銀盒等，都是陰綫刻紋的精品。隱起鑿花手法，在銀器起花中也是比較盛行的。如雙獅紋蓮瓣銀碗、龜紋桃形銀盤、鶯鳥紋六瓣銀盤及舞馬啣杯紋銀壺，都是這種工藝的代表作。鏤空銀薰球，小巧玲瓏，刻鏤精細，使人愛不釋手。該墓光素銀器數量較多，其中鏤空三層五足銀薰爐，造型雋秀，可置可掛，使用方便，是這類銀器的代表作品。一九七五年西安南郊西北工業大學出土了四件銀器，其中雙魚寶相蓮瓣紋銀盤，底部鑿刻五十三字銘，記述此盤為李勉於唐代宗大曆二

年前任洪州刺史時進奉。是一件難得的中唐銀器的斷代標準器。其器形、圖案及鑿刻方法，均與常見的唐代宮廷銀器不同，應是洪州地區（今江西南昌）打造的，具有鮮明的地方色彩。其餘的雙鴻小簇花紋銀碗、鴛鴦鴻雁折枝花紋銀碗、黃鸝折枝花紋銀盤，也與常見宮廷銀器式樣有所區別，器身較淺，圖案題材以花鳥為主，都製成中心團花、周邊配以橢圓形折枝花、器口飾以花瓣紋形式，花紋皆陰刻並鑲金。內蒙古喀喇沁旗出土了六件鑲金鑿花銀器，其中四件銀盤，均係六瓣花口，大口沿，淺腹平底。沿邊上平鑿六組折枝花，腹刻橢圓花六組，內底錘隱起獸紋，錘鑿之工極精，有如游絲描。其中鑲金蹲鹿紋銀盤最爲精緻，口沿花紋作隱起鑿刻處理，與其它之盤平鑿手法不同。總之，這四件銀盤的形制、圖案、鑿刻手法均十分接近，可代表八世紀下半葉中唐時期銀器工藝風格和錘鑿水平。陝西耀縣柳林背陰村出土了唐代窖藏銀器共十九件，其中塗金刻花五曲銀碟，碟心刻大葉團花，內腹刻五簇大葉橢圓花，底刻鹽鐵使臣敬晦進等十二字銘。此應是敬晦任鹽鐵轉運使時爲進奉唐宣宗李忱而造。這一批銀器的作工和器形大體相同，應是同一時期的作品。刻花「宣徽酒坊」銀碗和銀羽觴，雖保留了盛唐時的基本形制，但器形已不規整，鑿花也較呆板，缺乏盛唐時的韻味。高足杯的形制與盛唐時期相比變化較大，具有晚唐銀器的時代特徵。西安交通大學出土了三件銀盒，其中都管七國六瓣銀盒以隱起與鑿刻手法，描寫釋迦赴七國的佛教故事。像這種佛教題材的銀器極爲罕見。這三件銀器的器形與圖案，有着典型的晚唐風格。陝西藍田楊家溝出土了十一件金銀器，其中鴛鴦綬帶紋銀盤，底部鑿「桂管臣李棹進」銘。鳳啣綬帶紋五瓣銀盒，底部鑿「咸通七年」銘。由此可證這批金銀器爲晚唐製品。這批金銀器的花紋，主要是花鳥、綬帶等，同時還出現了「卍」字及方勝圖案，特點鮮明。西安東郊新築出土的銀器有銀渣斗、銀盤、銀碗、銀錠等。銀錠鑿「乾符六年」銘，銀渣斗口沿作喇叭形，束頸、寬腹、圈足，口、腹均取四瓣形，每瓣鑄飾橢圓形花草，是典型的晚唐形式。

以北方出土金銀器中的記年器和準記年器爲標準，可以排定唐代金銀器發展的基本序列。按照這一系列考察南方出土的幾批金銀器，對南北金銀器之異同比較明瞭。湖北安陵王子山唐吳王妃楊氏墓出土的金釵、金筓等一百餘件貞觀年間金銀首飾，是出土唐代金銀器中年代最早

的一批，這批首飾，多採用掐絲鑲嵌手法，反映了唐初宗室王族占有金銀器的狀況及當時金銀器工藝水平。南方出土金銀器中最重要的是江蘇丹徒丁卯橋出土的八世紀中葉至九世紀中葉製於潤州（今江蘇鎮江）的一大批銀器，共九百五十六件。這批銀器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既無波斯薩珊朝銀器，也無仿製薩珊朝的銀器或受其影響的銀器。（二）器物的圈足高而外撇，呈喇叭形狀，花口器較多，有內弦、外弦，弦弧彎度較平。四分花口曲度變化多樣。（三）器胎較薄，鑄刻圖案顯出淺隱起效果。（四）圖案以花鳥為主兼及魚蟲等。不見獅、鹿等圖案。以上四點，在北方銀器中也有所體現。對這一現象，可以這樣認識，中晚唐時期地方官吏進奉之風興盛，大量的南方金銀器流入宮廷，對內廷和北方金銀器工藝的影響增強，南北風格漸趨接近。另一批重要發現是浙江長興發現的一百餘件晚唐銀器，有銀杯、羽觴、湯勺、釧、釵等。其中銀羽觴口、腹均作八曲橢圓形，器內、口沿施以珍珠地幾何紋花邊，器底鑄雙龍魚戲珠紋，火焰寶珠隱起於正中。此器應是薩珊朝八曲銀洗晚唐時期的變體，但器形已有自己的特點。此銀羽觴的出土，補充了江蘇丹徒丁卯橋出土銀器之缺環。江蘇鎮江甘露寺鐵塔塔基出土了一批金銀器，主要器物有打製於長慶四年（公元八二四年）及太和三年（公元八二九年）的金棺、銀槨。金棺、銀槨均鑿飾迦陵頻伽、飛鶴、飛天、飛雁等圖案，鑄刻陰綫粗獷有力，應是當地製造。廣州皇帝崗唐木槨墓出土了銀質鍍金頭飾及花牌、圓錐釵、花穗釵、花鳥釵等銀首飾，均經錘鑠、鑿刻而成，尚屬精工。在嶺南地區唐墓出土金銀器甚少的情況下，這批銀器同出於一墓是十分難得的。

從上述出土金銀器來看，隋、唐金銀器工藝自始至終盛而不衰。隋、初唐、盛唐、中唐、晚唐金銀器風格的變化極為鮮明。中唐以後，南方金銀器工藝仍然盛行，對內廷乃至全國金銀器工藝的發展產生了較大影響，並為五代、宋金銀器工藝的發展提供了物質和技術條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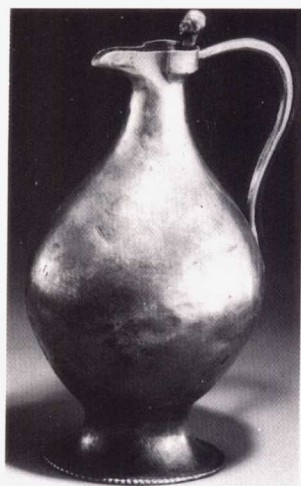
五代時期的金銀器，在安徽合肥南郊、江蘇蘇州七子山、浙江臨安板橋、四川成都老西門外等地均有發現，但墓葬大多被盜，出土器物精者匱乏。總的來看，其藝術風格與製作技術已去唐甚遠。

宋王朝的建立，結束了中原的分裂局面。生產得以發展，城市經濟逐步繁榮。據《東京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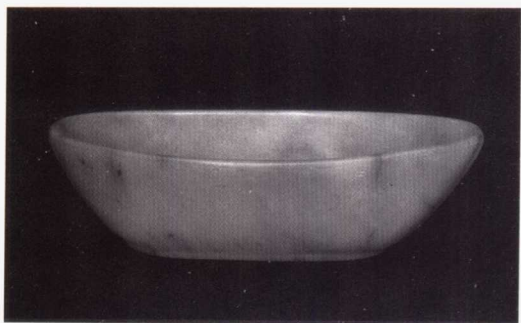
插圖七 銀塔

華錄》記述，這時的皇親貴戚、王公大臣、富商巨賈，都享用着大量的金銀器，甚至連酒樓妓館的飲具也用銀製，可見用銀量是相當大的。迄今出土宋代金銀器的地點有江蘇連雲港海清寺阿育王塔、鎮江甘露寺塔基、溧陽小平橋、南京幕府山宋墓，浙江瑞安北宋慧光塔、衢州市南宋墓，福建邵武，江西永新劉沅宋墓、彭澤易八娘宋墓，四川德陽孝泉鎮、綿陽魏城宋代窖藏，陝西扶風上宋柳家等地。江蘇溧陽小平橋出土的瑞果圖鍍金銀盤、乳釘獅紋鍍金銀盞等都極為別緻。尤其是乳釘獅紋鍍金銀盞，外壁飾以乳釘，類似青銅彝器，古色古香，是宋代仿古思潮在銀器製作上的反映。南京幕府山北宋墓出土了鷄心形金飾、龍鳳金簪、團龍金簪、金絲櫛背、銀粉盒、鍍金銀盒及銀刀等一批金銀器。其中最精緻的是以鏤空、鑿刻、掐絲等手法製成的鷄心形金飾，紋飾為一對鳳凰翱翔於牡丹叢中，作工考究，寓意吉祥。這些金銀器顯示了宋代金細工藝的高超技術，同時也反映了富庶人家日常所用金銀器的品種。浙江瑞安北宋慧光塔出土的銀瓶、鍍金舍利瓶、鍍金銀杯、鍍金銀塔、銀葫蘆等，作工皆極精妙。尤其鍍金銀塔，首次在南方發現，堪與山東莘縣出土的十一層方身銀塔（插圖七）相媲美。衢州南宋史繩祖墓出土的金簪、銀絲盒、八卦紋銀杯、八角形銀杯、銀碗、銀梅瓶等，已完全擺脫了唐代風格的影響，成為宋代金銀器的典型代表。如八角形銀杯、八卦紋銀杯、銀梅瓶、銀絲盒，都是嶄新的造型。其中銀絲盒分內外兩層，內層為薄銀片，外層以銀絲編成網紋，盒蓋中央編出六瓣花形，編綴後焊於內層的銀片上。造型新穎，前所未見。江西永新北宋劉沅墓、彭澤易八娘墓均出土少量金銀首飾。如金髮簪、金帶飾、銀梳、金耳環、銀鐲等。其中易八娘墓出土的銀梳，鐫有「江州打作」銘，甚為難得。江州即今九江。四川宋代金銀器尚不見墓葬出土，僅出於窖藏。德陽孝泉鎮清真寺、綿陽魏城都發現了宋代窖藏銀器。德陽孝泉鎮窖藏銀器有梅瓶、匣形器、執壺、尊、茶托、茶杯、鏤空盒等，器形工整，與當時瓷器、漆器的風格頗為一致。如斗笠形杯、菊瓣紋杯，如意雲紋梅瓶、匣形器、執壺等，器體比例均衡，秀麗瀟灑，無嬌柔造作之弊，給人以恬靜舒暢的美感。器物的高足廢除了僵直的斜綫形式，均作成曲綫，與器身、花口上的弧形相和諧。圖案組織仍於中心飾團花，外圈纏枝呈四曲或八曲，花葉處理乾淨利落，清新悅目。鏤空銀盒的發現，迄今還是一件孤例。它與浙江衢州史繩祖墓出土的銀絲盒相似，同是宋代銀



插圖八
人首銀執壺

插圖九 玉杯



器中的獨特產品，其淵源有待進一步探明。銀器上的銘文，對研究器物的占有者、產地、斷代有重要的參考價值，這批銀器，從其形式、圖案分析，應屬南宋之物。從「己酉德陽」、「癸巳南宅號」銘，斷定其年代為南宋理宗時期比較合適。陝西扶風出土的嬰戲銀大鈔、十瓣花口銀杯、素面銀碗，都是典型的宋代銀器。其中嬰戲銀大鈔，人物作高浮雕處理，極為生動。

遼代銀器製作業十分發達，建國後在內蒙古、遼寧、吉林、河北都有重要發現。內蒙古赤峰洞後村出土了兩件魚龍提樑壺和一件銀鷄冠壺。前者模仿唐代銀器。後者雖為契丹民族形制，但蹲鹿、石、草等組合圖案，又是從唐代移植而來。內蒙古敖漢旗李家營子遼墓出土了人首銀執壺（插圖八）、獵豹紋鍍金銀盤、橢圓銀杯、小銀壺、鑿花透雕金帶飾等，其人首銀執壺具有伊朗薩珊朝風格，獵豹紋鍍金銀盤和鑿花透雕金帶飾有唐代遺韻。橢圓銀杯的形制，在傳世遼代玉器中也可以見到（插圖九）。遼寧建平、新民遼墓出土了一批金銀器。建平張家營子出土了二龍戲珠鍍金銀冠、鳳形金耳飾、金鐲、銀花、塗金鑿花銀鞍飾、銀鍍金馬具等，建平硃碌科出土了銀匕、鑿花金手鐲、魚形金耳飾、金墜等。新民巴圖營子出土了人物魚舟金簪。這些金銀器為遼境工匠所製，作工和圖案仿唐制，但地方民族色彩已很濃厚。凡鳳凰、孔雀等禽類紋飾，都與鷲相似，眼神凶惡，鈎喙尖銳，爪尖鋒利。反映了契丹人在長期的狩獵生活中對鷲的一種偏愛。遼代晚期金銀器出土於內蒙古巴林右旗窖藏和庫倫旗墓葬。巴林右旗發現的窖藏銀器有八棱鑿花銀執壺、八棱鑿花銀溫碗、柳斗形銀杯、荷葉敞口銀杯、二十五瓣蓮花口銀杯、海棠形鑿花銀盤及銀筒等，這批銀器完全是中原形制，看不出任何契丹族特點。庫倫旗墓葬出土了鍍金銀帶和菱形銀帶飾各一件，鍍金銀帶飾隱起的行龍和骨朵雲都是宋代模式。遼境金銀器的這種演變過程，實際上也反映了遼境契丹族日益漢化的不可抗拒的總趨勢。

金代金銀器工藝的發展情況目前掌握材料不多。陝西臨潼出土的金代窖藏中的金鳳步搖、銀髮簪、銀項圈、銀鐲及扶風上宋柳家、法門寺等處出土的金代器物，反映了女真族與漢族在風俗和文化上的融合與一致。

割據於西北地區的西夏國大體與兩宋相始終，一九七六年寧夏靈武石壩出土的銀碗、銀盒、銀髮飾和一九七二年寧夏李遵項墓出土的金銀器表明，西夏與兩宋金銀器工藝有着密切關係。

插圖一〇 金坐佛



插圖一一 銀坐佛



插圖一二 金佛像



西南地區的大理國金銀器工藝的狀況，長期以來也是一個謎。一九七六年清理大理崇聖寺三塔時，塔頂、塔基均發現了大批文物，如金佛像、銀佛像、銀嵌珠金翅鳥、鑲金雕花銀圓盒、刻文金片、銀塔、金塔等。這些金銀器，分別採用鑄造、錘鑠、焊接、鑿刻等方法製成，並具有不同的時代風格。鑲金六瓣雙鳥紋銀盒，是標準的盛唐形式，TD中·五九金坐佛（插圖一〇）、TD上·一七銀坐佛（插圖一一）都是標準的宋代佛像式樣。TD下·一八金佛像（插圖一二）應是大理佛像形式。最能代表大理傳統風格的則是鑲金嵌珠金翅鳥。首先錘出頭、翼、身、尾、足等局部，經鑄刻細部之後，再焊接而成，製作頗為精緻。金翅鳥被尊為大理國的保護神，可懾服諸龍，消除水患，用以祈求農業豐收、國泰民安。此器反映了大理人的原始信仰，代表了大理國金銀器工藝的高超水平。

元、明、清三代金銀器工藝的發展，有着極為鮮明的時代特徵、民族特點和宗教色彩。

元代金銀器出土較多，江蘇吳縣呂師孟墓出土了金銀器三十餘件，其中如意紋金盤，經錘鑠鑄刻而成，金盤為四個隱起如意雲頭相疊而成，中心又錘鑠四個小如意雲頭，通體鑿陰綫纏枝紋，造型別致，鑿工精美。底刻「開宣造」銘。同墓出土的銀器有盃、扁盒、圓盒、柿形水盃、尊、勺等。這批金銀器中不見日常生活用器，都是文房用具或陳設品。江蘇無錫錢裕墓出土的一批金銀器中，鑲金花瓣式銀托盞，猶如盛開的牡丹，生機勃勃，有着無限的生命力，是元代銀器中最富特色的一件。這批金銀器大多是錢裕生前用器。安徽合肥出土的窖藏金銀器有盒、碟、杯、壺、匜、碗、瓶等一百餘件。其中金碟、銀壺鑿「章仲英」款，有蓋銀瓶刻「至順癸酉」款，銀碗圈足上刻有「廬州丁舖」銘，說明這批金銀器或者其中的一部份可能於至順九年前後在合肥打造。一九六六年江蘇金壇湖溪發現裝於元代青花雲龍罐內的一批金銀器，其中不少勒銘者，對研究元代金銀的發展有重要參考價值。如光素銀盤鐫有回歷「七一四年一月」款，即仁宗延祐元年。它為這批金銀器的斷代提供了依據。這批金銀器作工較精，尤其蟠龍銀盞、鑲金蓮花銀盞、凸花人物故事盤等，足以代表江蘇地區銀器工藝的尖端水平。蘇州盤溪小學內發現的張士誠母曹氏墓出土了金簪、金釵、金耳環、銀奩、銀托盤、銀架等金銀首飾和器具，打製亦很精巧，可能都是蘇州所製。上述元代金銀器中，有相當一部份集中出土於長江下游與太湖之間，